

论汉魏诸子的社会风尚批评和人物批评

杨康^{1, 2}

(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100720;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732)

[摘要] 汉魏易代之际, 社会思想也随之变迁, 在动荡的年代面对社会的种种混乱现象, 汉魏诸子通过著书立文对社会风尚和人物品评各抒高见, 王符、仲长统、荀悦、徐干等人的论述, 是推动汉魏之际思想轨迹变迁的重要人物。他们的社会风尚批评, 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坚守; “崇真求实”的人物批评也开启了汉魏“名实”思潮。

[关键词] 汉魏诸子; 社会风尚批评; 人物批评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18.03.013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8)03-038-04

一、社会风尚批评: 对儒家思想的坚守

社会风尚批评是汉魏诸子社会批评中的重要内容。汉魏诸子多重视风俗对于国家的影响。

在世风日下的时期, 士人们痛感风俗凋敝, 他们将思想与笔触聚焦于此, 因为能够通过批判之文警醒世人, 挽救颓势。这些风俗批评, 不仅生动全面展示了汉晋之际的社会风貌, 也通过这些批评话语展示士人的批评态度、批评精神, 传递出土人的社会忧患意识和责任感, 更体现出一种对真、善的审美追求。

无论何时, 世风败坏的征兆总会体现于奢靡的盛行上。自东汉后期开始, 人们就逐渐受到了奢靡之风的侵染。王符、仲长统、崔寔等人都对由王公贵族引起的自上而下的奢侈之风进行了批判, 他们骄纵放肆, 大兴土木, 极尽奢靡之事, 鱼肉百姓, 破坏了淳朴的风俗, 使巧诈、攀比之风益盛, 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更是颠倒了人们原本朴素的价值观。对于这些毫无恩义、骄奢纵欲王公贵族对于世风的损害, 仲长统提出收回他们的权力以恢复礼制, 《昌言·损益篇》: “时政凋敝, 风俗移易, 纯朴已去, 智慧已来。出于礼制之防、放于嗜欲之域久矣, 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资者也”^{[1] (P275)}。崔寔从破坏传统礼制的角度来看, 奢侈之风的盛行极大扰乱了原有的统治秩序, 《政论·阙题三》: “不厚为之制度, 则皆侯服王食, 僭至尊, 踰天制矣。是故先王之御世也, 必明法度以闭民欲, 崇堤防以御水害。…下僭其上, 尊卑无别”^{[1] (P78-80)}。

伴随这股奢靡之风的, 是人们对于富贵、荣利的盲目追逐。人们之间的交往, 不再追求志同道合。造成浮华交游之风盛行的根本原因, 就在于朝廷选士只重虚名而不求实察, 《中论》: “取士不由于乡党, 考行不本于阀阅, 多助者为贤才, 寡助者为不肖,

序爵听无证之论, 班禄采方国之谣。民见其如此者, 知富贵可以从众为也, 知名誉可以虚哗获也。在朝廷察举制度的弊端下, 人们看到国家取士不是看重真实的品行和才能, 而是在于获得的赞誉, 于是士人为了求取功名而四方交游, 不修德行道艺, 虚伪矫饰, 沽名钓誉者不可胜数。

对此, 诸子都提出回归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 强调对修己求真, 倡导君子之道。荀悦提出要“守节”“克济”“求己”, 《申鉴·政体篇》: “好恶之不行, 其俗尚矣。嘉守节而轻狭隘, 疾威福而尊权右, 贱求欲而崇克济, 贵求己而荣华誉, 万物类是己。夫心与言, 言与事, 参相应也。好恶、毁誉、赏罚, 参相福也。六者有失, 则实乱矣。守实者益荣, 求己者益达, 处幽者益明, 然后民知本也”^{[2] (P51)}。让守实求己者得到应有的名位, 而不让那些轻浮、谄媚的重荣利之人得逞, 自然会民众和民风回归正道。仲长统推崇仁爱笃恕、谦逊敬让、以诚相待的君子之道, 《昌言·阙题八》曰: “人之交士也, 仁爱笃恕, 谦逊敬让, 忠诚发乎内, 信效著乎外, 流言无所受, 爱憎无所偏, 幽闲则攻己之所短, 会同则述人之所长。有负我者, 我又加厚焉; 有疑我者, 我又加信焉。患难必相恤, 利必相及。行潜德而不有, 立潜功而不名, 孜孜为此, 以没其身, 恶有与此人交而憎之者也”^{[1] (P383)}。徐干通过对古今交游的对比, 提出心目中理想的交友之道乃是务实、求贤的“君子之交”: “古之交也为求贤, 今之交也为名利而已矣。……故君子于是伦也, 务于其实而无讥其名”^{[3] (P221)}。

与当时浮华交游之风密切相关的, 便是虚伪矫饰之风。察举征辟制度下重视士人的德行和名誉, 为了能够仕途通达, 士人做出各种矫饰之行以求得虚名可以上位。为了能够获得清誉, 有人过分讲究清贫刻苦, 有人即便自己妻子冻死了也不肯接受施舍, 有人更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德行做出了很多逾制

[投稿日期] 2018-03-21

[作者简介] 杨康 (1982-), 女, 河北石家庄人, 编辑,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汉魏两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

的服丧行为等等,如此之行却显示了他们不过是名不副实、虚有其表之人,为了获得名利却在无形破坏了德行、是非的观念,危害甚重。

面对风俗沦丧,诸子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王符明确指出世风淳美与否的关键还在于君主,“世之善否,俗之薄厚,皆在于君。”(《潜夫论·德化》)。这些不良之风的源头就在于统治阶级,底层百姓不过是附庸效仿,作为社会风气的风向标,上层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荀悦明确提出了“正俗”之说,主张按照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民众的行为,规范人民的心志,显善彰恶,以摒除淫风,《申鉴》:“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肃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忒惑,外无异望,虑其睹去微幸,无罪过不忧惧,请谒无所听,财赂无所用,则民志平矣,是谓正俗”^[2] (P15)。荀悦在此也提到了“事无不核”乃是“正俗”的前提,可见荀悦的风俗批评观念中很注重“崇实”的一面。

仲长统也看到了王室子女道德败坏是造成世风日衰的重要原因,《昌言·阙题五》曰:“然而生长于骄溢之处,自恣于色乐之中,不闻典籍之法言,不因师傅之良教,故使其心同于夷狄,其行比于禽兽也。长幼相劾,子孙相袭,家以为风,世以为俗,……”^[1] (P357) 要想澄澈风俗,必须从整饬他们做起。因此,他仲强调通过教育培育良好的性情和德行,以澄澈风俗,“敦教学以移性情,表德行以厉风俗”。

徐干也重视教育对于世风的影响,认为可以发挥“六艺”的作用来移风易俗,“孔子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中论·艺纪篇》)六艺虽然有不同的功能,但是其根本是一致的,《中论·艺纪篇》:“艺者,心之使也,仁之声也,义之象也。故礼以考敬,乐以敦爱,射以平志,御以和心,书以缀事,数以理烦。……六者虽殊,其致一也。其道则君子专之,其事则有司共之,此艺之大体也”^[3] (P127)。六艺可以成礼敬、勉仁爱、解怨和睦、明示训诫,从而达到修德治民,风清气俗。

此外,对于流行于此时的迷信,诸子也都突破了汉代的“天人感应”观念,强调人对于自我命运的主宰以及德行对于命运的影响。《潜夫论》中,王符在《卜列》《巫列》《相列》《梦列》中探讨了相关问题,不管是依靠占卜、梦境还是依靠面相、骨相来判断命运都是不可靠的,王符并不认为上天无法保证事情的吉凶人,人及其活动才是决定命运的主宰力量,认为人的吉凶主要由自身的品行决定的,有德行的人自会有福报,人们也应坚守正道。“

对于汉代流行的“天人感应”说,仲长统也摆

脱了这一说法的影响,更看重人事的作用,将天道看做人事的附庸,明确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突出人对于事物的主宰作用,也认为不管是生病还是遭灾,都不应求助鬼怪乱神,强调自身德行的修养。

在《申鉴·俗嫌篇》中,荀悦也并不认同卜筮之法,认为天象与人事之间并无关系:“人承天地,故动静顺焉。顺其阴阳,顺其日辰,顺其度数。内有顺实,外有顺文。文、实顺,理也,休征之符自然应也。故盗泉、朝歌,孔、墨不由。恶其名者,顺其心也。苟无其实,徼福于忌,斯成难也”^[2] (P113)。

在迷信的批评中,汉晋诸子都秉承着“疾虚妄”的精神,刺破各种迷信活动的神秘面纱,强调个体主动对命运的掌控,以德修身,以积极的心态来面对命运,显示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二、人物批评:以崇真求实为标准

人物批评是这一时期社会批评的重要内容,原因就在于当时出现了各种社会问题都与之相关,宦官外戚专政,察举制下的人物失实,并由此更加激发了各种社会矛盾。诸子都意识到人才问题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并围绕“贤才难以见察”这一问题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对人的深入体察,对名实、德才、才性等问题的讨论,逐渐开启了新的人物观念,揭开了魏晋人的觉醒时代。

(一) 反对用人唯亲,小人见信

当时人才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贤者之不见察”。贤才之所以被埋没,首先就既有君王、用人制度的因素,也有小人当道的干扰。

首先,选人制度的腐朽成就那些了攀附会之徒,他们借助权势和金钱,阿谀谄媚,占据了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位置,《潜夫论·考绩篇》曰:“群僚举士者,……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听所以数乱荒也”^[4] (P989)。而把持人才选举的统治阶级沉迷于权力带来的名利,且君主不能明辨人才,一味听进小人的谗言,最终导致坚守正道的贤才没有被选拔的机会,《政论·阙题一》:“夫淳淑之士,固不曲道以媚时,不诡行以邀名。耻乡原之誉,绝比周之党。……而世主凡君,明不能别异量之士,而适足受谗润之愆。……是以命世之士常抑于当时,而见思于后人。以往揆来,亦何容易”^[1] (P50)!由此也体现出对于正直、独立的君子的肯定。

贤才之所以难以见拔,还因为他们还受到来自小人的嫉妒、诋毁和迫害,“循善则见妒,行贤则见

嫉也，而必遇患难者也”(《潜夫论·贤难》)。王符以舜禹和伍子胥为例说明上圣大贤还受此劫难，普通贤士更是难逃于此。也正是在这些人的嫉妒迫害中，“处士不得直其行，朝臣不得直其言”(《潜夫论·贤难》)。品行高尚之人受到不公的待遇，更是混淆了人才的是非忠奸，对此，王符特别提倡言行笃实的贤才《潜夫论·贤难》：“且凡士之所以为贤者，且以其言与行也。忠正之言，非徒誉人而已也，必有触焉……”^{[4] (P63)}这种对于言行的倡导，也是对于当时虚浮人才观念的反拨，也体现了王符人物批评中一贯的“求实”精神。

(二) 重实不重名

针对选才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秉承崇实、求真的人物批评原则，诸子都提出了重实不重名的人才标准。王符针对人才选拔中的名不副实，王符认为不能仅凭人物的名声，而应从士人的言行两方面来判断，《潜夫论·贤难》曰：“且凡士之所以为贤者，且以其言与行也。忠正之言，非徒誉人而已也，必有触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痂而已也，必有驳焉。然则循行论议之士，得不遇于嫉妒之名，免于刑戮之咎者，盖其幸者也”^{[4] (P63)}。

荀悦从自知不易这方面，说明人物评鉴更应该重视内在的真实，《申鉴·杂言下》曰：“或问：‘知人、自知孰难？’曰：‘自知者，求诸内而近者也；知人者，求诸外而远者也，知人难哉。若极其数也，明有内以识，有外以暗；或有内以隐，有外以显，然则知人、自知，人则可以自知，未可以知人也，急哉’”^{[2] (P188)}。知人的难处在于，人的心意或昭然外漏，或隐藏于内，或佯装为此而意在彼，内心与外在言行宗会有不一致之处，人们为了出于各种目的矫饰言行，因此，了解自己不易，了解他人就更困难。荀悦此言，乃是根据当时朝政难议而出。汉末诸子对于矫饰言行的出发点不同，但共通点都在于认识到人的内外有别，人物难鉴别，在这背后，也体现了这一时期士人批评中的“崇实”原则。

徐干分析了君子名不副实的原因，并提出应从人物的言论和实际行为两方面来判断人物的真才实能。对于人物的言论，徐干更注重内容而不是言辞之巧拙，《中论·慎从》曰：“故今巧者常胜，拙者常负，其势然也。此谓中主之听也。至于暗君，则不察辞之巧拙也，二策并陈，而从其己之欲者。明君不察辞之巧拙也，二策并陈，而从其致己之福者”^{[3] (P327)}。对于言行二者孰为轻重，徐干则认为行更重要，《中论·贵验》曰：“笃行之则用日久，用日久则事着明，事着明则有目者莫不见也，有耳者莫不闻也，其可

诬哉”^{[3] (P76)}！重视自己的行为，才能成就君子的美誉：“故凡道，蹈之既难，错之益不易，是以君子慎诸己，以为往鉴焉”^{[3] (P107)}。君子的行为既会带来荣显，也会招致卑辱，因此要更加慎重，不能拘泥于小节而忽视了大义，或者不知权时，失其所宜。

这些观念虽然逆时而立，但却是客观合理的，显示了其独立的批评态度和崇实的批评精神。

(三) 德才并重，才重于德

面对汉代察举征辟制度的失败诸子都普遍意识到德行取士的弊端，他们对于人才问题的思考，逐渐深入人物本身，人物的才性、气质等逐渐被提到愈加重要的地位，而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更是直接引发了玄学等思想的生发，进而影响至魏晋文学批评的展开。对于才能与德行之间的取舍，有一个从德才并重至才重于德的渐进过程，而这一观念的发展，也体现人的观念的自觉历程。

王符的人才观念是德行并重的，“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潜夫论·论荣》)。荀悦将德才统一以来，提出“有德之才”为本，而“无德之才”是末。所谓有才之人，都是德才兼备者。为何有德之人被看做有才之人，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行为如何，故曰“以行之贵”。《申鉴·杂言下》曰：“曰：‘才之实也，行可为，才不可也。’曰：‘古之所谓才也本，今之所谓才也末也，然则以行之贵也。无失其才，而才有失’”^{[2] (P182)}。荀悦特别肯定君子之美，认为君子之美在于“本乎真实”，强调人物的内外兼修，“肃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忒惑，外无异望”(《申鉴·政体》)。荀悦的人才观念也体现了“崇实”的精神，对于人才的品鉴更重视行为，而非其名。这也是汉末人物批评中的共通之处。

徐干对人才的名实、德才、言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辨析。对于名实，他强调“名”乃实名而非虚名，《中论·考伪》曰：“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3] (P205)}。君子之名，乃是源于有君子行为品性之实，而非先有了君子之名，才有君子之事。徐干对名实问题的阐释，合理地解释了为何人们要追求声名以及声名的内涵所在。从治国的角度，他更加看重才智，“圣人贵才智之特能立功立事”(《中论·智行篇》)。徐干多处以圣人为例，论述了德行之美不能和成就帝业的智谋相提并论的。这种重视才智的人才观，也是汉魏人物批评观念发生转变的重要特征，成为魏晋人才品藻风尚之先导。

徐干尚“才智”的人才批评观念与其生活在汉魏乱世之际，目睹生民涂炭密切相关。面对乱世，

只有才智可以有助于济民救世,而只有操行之人无益于解民倒悬。在徐干的才智观下,他对于舍生取义也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认为那些明哲之士胜于志行之士,《中论·智行》曰:“殷有三仁,微子介于石不终日,箕子内难而能正其志,比干谏而剖心。君子以微子为上,箕子次之,比干为下”^[3](P156)。在此,徐干流露出一种新的生命价值观,能够明哲保身是一种明智,对生命的维护和保全正是智者的可贵之处。

(四)各有所长,不因小失大

在对人物才能的深入考察中,人们也逐渐关注才能的多样性这一问题。对此,王符提出了“各才所长、量才授任”的人物观,《潜夫论·实贡》:“智者弃其所短而采其所长,以致其功,明君用士亦犹是也。……是故选贤贡士,必考覆其清素,据实而言,其有小疵,勿强衣饰,以壮虚声。一能之士,各贡所长,出处默语,勿强相兼,……各以所宜。量材授任,则庶官无旷,兴功可成,太平可致,麒麟可臻”^[4](P205-207)。王符提出要“据实”看待人物身上的短处,不能为了名声而掩饰,强调“诚实”看待人物。王符秉承客观、开放的态度,诚实面对人物真实才性,坦然接受人物的不完美,正体现了其“崇实”的批评精神。这种“处其实,不居其华”的精神,也是王符人物批评观的总体原则。

荀悦提出不“以小怨弃大德、以小过黜大功、以小失掩大美”,显示了其人才批评观念中不因小失大的一面。不因品德和行为上的小瑕疵而全面否定个体的德行、功劳和才能,这种选人观念源于荀悦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体现一种“崇实”精神。荀悦的这种人物批评观念,作为对时代问题的回应,既具现实性,也包含着有人性的思考,体现了这一时期人物批评的特征。

三、结语

我们从以上这些人物批评和社会风尚批评中不难看出,汉魏诸子已经开启了魏晋的“名实”思潮。他们对于人物的批评,一方面注重从人物的社会价值、社会影响出发,强调个体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注重辨名析实,其不仅仅从人物的名声做出判断,而是深入人物本身的行为及其社会影响来看是否名实相符,所采用的是“名实相一”“辨名析理”的方法,这也是魏晋时期社会思潮形成所依凭的主要方法。“名实相一”原来是先秦名家和法家常用的一种基本的思辨方式,随着魏晋时期百家争鸣的再度兴起,“名实相一”也成为魏晋时期思想家讨论才性问题时所采用的一种重要方法。汉魏之际,鉴别人物作为一项时代命题被摆到了人们面前,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们为了深刻揭露现实政治中存在的“人职不符”,以及选用人才时重名而不重实的种种弊端,提出了“名理者必效于实”的主张,提出由外在的差异而推知其体内才性之不同,作为考察社会政治和各级官吏以及鉴识人物的重要方法。而“名实之辩”的思潮对魏晋玄学有着深切影响。通过对汉魏诸子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出易代之际思想发展的轨迹。而他们在人物批评中对儒家伦理道德的坚守,则从侧面反映出易代之际儒家思想虽然式微但并未被彻底颠覆,而是发挥着潜在的影响力,这也是我们关注这一时期需要特别注意的。

参考文献:

- [1]孙启治.政论校注昌言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2]孙启治.申鉴注校补[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3]孙启治.中论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4]彭铎.潜夫论笺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4.

[责任编辑 王云江]

The study on the social fashion criticism and character criticism of the scholars of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YANG Kang^{1,2}

(1.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Beijing 100720, China; 2.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social thought had been changed. In the turbulent times, in the face of various social disorders, the scholars of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 on social fashion and people's characters through their books. The expositions of Wang Fu, Zhong Chang tong, Xun Yue and Xu Gan were important figures to promote the change of social though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Their social fashion criticism embodied the adherence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advocacy of real character criticism also opened up the trend of thought of "fame and truth" in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Key words: scholars of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social fashion criticism; character criticism